

规范操控下的中国近代小说翻译

廖蓓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中各项活动,如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译作的推出等均受到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和规范。文章借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考查和探讨中国近代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对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活动的规范情形,对中国近代小说翻译进行描述性分析,重新审视这段颇有争议的翻译史。

[关键词] 翻译规范; 操控; 中国近代特定社会文化环境; 近代小说翻译; 描述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109-04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主要以翻译小说为主,是中国小说翻译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数量空前绝后且种类齐全,但就翻译质量而言,可以说当时绝大部分译文都不忠实于原文。依照“忠”、“信”的标准,长期以来那整整一代的翻译小说常被翻译评论家贬斥为“胡译”、“乱译”。近些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理论的发展,翻译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大转向,由文本层次的原文与译文的对比研究(词法、句法等语言结构和表达及语篇、文体风格、审美效果等)转移到了影响文本的外部宏观层面(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姆斯的描述翻译理论,提出了翻译规范论,将翻译研究重点由原作中心的规定性研究转移到译作中心的描述性研究,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翻译诚信观”的历史局限,摆脱孤立研究译本的理论桎梏。借助于图里的规范理论我们对近代小说翻译的研究也就能摆脱传统的翻译标准——“忠实”的桎梏,考查和探讨中国近代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活动的规范情形,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普遍存在使原著适应译语文化的现象,对它进行更为客观的描述性分析。

一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特点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逐渐加深:反侵略战争的失利,朝廷的衰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这些都使得“救国图强”成了时代最鲜明的主题,向西方学习成为主流,翻译成为首要手段。无论是起初的实用科学翻译,甲午战败后的自然社会科学翻译,还是戊戌之后启迪民智的小说翻译,无一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切皆为宣传、启蒙、救国,就连小说翻译的勃兴也是缘于它已被神化了的救国功能:“且闻欧

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这一时期小说翻译特点主要有:

(一)翻译数量的庞杂且良莠不齐。从1898年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大量外国小说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译事之兴盛,使得翻译小说数量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创作小说。有据可证的如,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著录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竟达400种。而据阿英估计,当时的创作小说的实际数量,可能两倍于120种,翻译小说的出版,可能更有两倍于创作小说之数。这种数量对比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如1919-1950的三十年,1950-1990的四十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二)文学意识薄弱。在近代翻译小说中,固然也翻译了部分世界名著,如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英国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等,但从总体来看,名著不到翻译小说的10%,90%以上的译作是属于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作品。1906年前,中国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或由日文本重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大约70余种,但对日本著名作家如二叶亭四迷,幸田露伴,樋口一叶,夏目漱石的作品却几乎没有翻译,虽然翻译了日本另一个著名作家尾崎红叶的几部作品,如吴櫟所译的《侠黑奴》、《寒牡丹》、《美人烟草》等,但却没有一部是红叶的代表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在于当时精英知识分子译书的目的主要在于输入文明借鉴其思想意义而不是考虑其文学价值,因而底本的选择不大考虑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意识薄弱。

(三)“意译”风尚浓厚。以意译和译述为主要翻译方式对原作进行的任意删改以及文学的政治化。近代中国,不管是精通外语的译家如周桂笙、陈鸿壁抑或是稍懂或不懂外文

[收稿日期] 2008-03-21

[基金项目]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编号:06036B)

[作者简介] 廖蓓辉(1973-),女,湖南衡阳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讲师。

的译家如梁启超、包天笑、林纾都采取意译的风格以顺应中文的语言、文化和篇章传统,“意译是中国近代小说翻译的时代风尚”。^[2]

二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及其分类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在对希伯来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姆斯的描述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翻译理论探索》(“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0)和《描述翻译学及展望》(“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1995)聚集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翻译研究重点由原作中心的规定性研究转移到译作中心的描述性研究,探索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尝试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翻译的多维性质。翻译规范是图里翻译理论的核心。他认为,规范是社会公认的普遍的价值观或文化规则,广泛地适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它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和各种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之一的翻译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化活动因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行为,自然也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便构成了翻译的规范。根据图里的划分,^[3]翻译规范可以分为两大类:译前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这些翻译规范在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指导着翻译活动,是译者翻译活动的行为准则和依据。

(一)译前规范是翻译活动中的宏观抉择规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翻译方针,二是翻译的直接程度。所谓翻译方针,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制约篇章类型以及某个具体文本的选择因素。翻译的直接程度涉及从最原始版本以外的其他语言版本进行翻译的临界线(threshold tolerance),即是否允许间接翻译。如果允许,可以接受的中介语言是什么等等。主要指与翻译方针有关的因素和与翻译直接程度有关的因素,如某一特定时代国家政治倾向、社会需要、文化潮流和经济利益等有关的翻译方针和制度。它制约着译者对不同题材、体裁、时代和流派等作品的选择。

(二)操作规范是翻译活动中的微观抉择。操作规范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做出抉择的因素,体现为译者使用的翻译技巧。译文中所谓省略、增添、位移和篇章切分等都受操作规范制约。例如,作为操作规范重要内容的篇章切分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或模式),他们之间的差别对翻译来说都起一些暗示作用,通常篇章切分越接近目标文化传统翻译作品的可接受性就越强。操作规范是在译前规范制约下的具体翻译规范,它和译前规范相比,表现更为灵活多样和因人而异。操作规范的取舍抉择除了遵循译前规范外,还取决于译者的个人文化因素。

三 翻译规范对近代翻译小说的操控

(一)“译前规范”与近代小说翻译的政治化

译前规范(preliminary norms)是决定译者在一定历史背景下选材倾向的关键因素,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需要、时代条件及面向何种读者群等影响翻译决策的问题。译者选

材政治化的倾向在近代小说翻译中尤为明显,其中又以梁启超、康有为、林纾为典型代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认为这次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国民的觉悟低,故欲救国必先开启民智,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小说。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有明确的论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列为十五门之一,收日本小说(包括随笔)1056种,这是我国第一本收外国小说的书目。作者在小说书目后的《识语》中说:“今中国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接着,首倡“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在他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肯定了译印政治小说对开启民智,增强国家观念的重要作用,他还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故英人云:“小说为国民之魂。”并且他身体力行,把译印政治小说作为他创办的《清议报》的六项主要内容之一。他还亲自翻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以政治小说在《清议报》上连载,接着《清议报》又连载了留日学生周宏业翻译的日本作家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这两部小说都表现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争取祖国独立、富强以及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爱国主义特色。他想以这类小说来启迪和教育处于封建专制、愚昧下的中国人。

林纾是一位爱国主义者,长于文学翻译的他也深深地受到政治化的影响。看到祖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他希望通过译书来抒发自己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同时警示国人激发斗志。从他撰写的一篇篇序、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翻译(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翻译)体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他译《黑奴吁天录》就是最明显的一例。他译此书系“触黄种之将亡”,而为前车之鉴。他说:“吾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5]他译《爱国二童子传》是“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他译《不如归》是因为“纾已年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以振爱国之志气”。他译《雾中人》是为了借“白人可以吞并斐洲,即可以吞并中亚”,来警告“读书者之青年挚爱学生……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他说“吾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他译《埃司兰情侠传》是为了倡导尚武精神,激励同胞,奋勇御辱。

同期其他译家如苏曼殊译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旨在唤醒民魂、鞭斥腐朽满清政权;陆龙翔译《瑞西独立警史》(1903)、江东老钝译英国勃莱姆的《一束缘》(1904)、大陆少年译法国佚名的《云中燕》(1905),均是为了唤醒沉睡中的中国人,使其感动奋发,投袂而起,以西国少年豪杰和巾帼英雄为榜样,振兴国势,再造中华。

由此看来,中国近代小说翻译的兴盛是因为中国晚清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需要,翻译小说要实现它“唤醒民众,救国图强”的社会功能;译本选择政治化、文学意识薄弱绝非译者文学素养低而是受当时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译

前规范制约的结果。

(二)“操作规范”与近代翻译小说“意译”风尚

这里所说的“意译”是泛指译作(由翻译发挥至创作,以苏曼殊译的《悲惨世界》为代表或为某种需要而对原文进行改造,如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删译(省略非故事情节部分或不符合国情需要的情节)、添译(在译文中加插译者看法、抒发自己的议论和观点)、改译(使原文行文中国化)等一切不忠实于原文内容的译介手法。译文中出现的删除、增添、位移和篇章的切分等都是操作规范制约的结果。操作规范涉及到各个翻译家在翻译时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对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意译的表现,人们历来论之甚详,^[6]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译者根据当时社会政治宣传的需要,对原作的主题内容进行改造。例如苏曼殊在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移花接木,自由发挥。该小说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曼殊译此书旨在影射晚清社会的黑暗。这本译著系译创各半的翻译小说,全书14回,除译作的首尾8回改动外,其中间的6回几乎是创作。甚至还在该译作的第7至13回,创造了一个激进的侠客人物兰德,“常发表抨击当时中国时政的言论”。这种翻译操作法,与其说翻译,不如说改译,由于删改过多,译文与原著相比,几乎面目全非,成了唤醒民魂、鞭斥腐朽满清政权的再创作。

为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宣传的需要,译者把作品中的主题、结构、人物都进行一番改造,如法国通俗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十五豪杰》(原名《两年的假日》),先由法文译成英文,后由森田思轩从英文译成日文,梁启超再由日文译成中文,并在第一回附言中说:“今吾此译,又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然自信不负森田。果尔,则此编虽令焦士威尔奴复读之,当不谓其唐突西子耶。”^[7]其实,凡尔纳的这部经过多次改译的小说,作品中的“小豪杰”也就变成译者各自心中礼赞的“小英雄”了。

2、译者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大段大段地将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删掉,或删除原作中不符合国情的情节以表现出译者伦理观或政治理想,所译的只是作品的故事情节的浓缩“意译”。这在当时极为普遍,即便是标为全译的小说往往也有删除的章节和段落。例如,我国早期翻译家伍光建翻译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法宫秘史》把原作中大段的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描写删除掉,其所译着重于故事情节、人物对白,偶尔有环境描写,也是用中国化的腔调改之,译文共30回,第一回开篇就是“话说一千六百六十年”,之后每回以“再说”开头,共用了29个“再说”,期间还不时穿插“且说”之类的套话。以此表现出译者的艺术趣味,迎合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翻译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时,根据当时的读者接受程度,他料想读者看不懂太累赘的欧化句法,就压缩或省略景物描写,把原作差不多删掉了三分之一。

1901年潘漠子(杨紫麟)和天笑生(包公毅)合译了英国哈葛德的《迦茵小传》。但译文只有原文的一半,内容被大量删节。对照原文就会发现这是译者有意识的漏译,被删除了

的部分主要讲述了迦茵与男爵之子亨利热恋,发生关系育有一私生子的前前后后。在封建传统中,妇女地位低下,又有三从四德的约束,在晚清时期迦茵的行为显然有悖于封建伦理道德,为世人所不耻。杨、包二位译者也持同样态度,故而有意删去这部分,美化迦茵的形象。

删除原作中不符合国情的情节以表现出译者政治理想在林纾的译本《黑奴吁天录》中最明显地反映出来。书中凡是与译者的政治诉求相冲突的地方一概遭到了无情的改写。我们知道原著的作者斯拖夫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原文中的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除了表达对黑奴的同情之外,作者盛赞了主人公汤姆大叔作为一名基督徒的美德:善良,坚忍。原著中有一章题为“Victory”记叙了汤姆大叔是如何惨死于奴隶贩子的毒手之下。但就在将死之时,汤姆大叔还是以德报怨原谅了毒害他的恶人们。最终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小主人。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汤姆之死,在她的笔下这简直如同圣徒殉道一般光荣。很显然在斯托夫人看来,汤姆虽死尤荣,是基督教的善对恶的胜利。这无疑是全书主题的一次升华。但在林纾笔下,却只有寥寥几笔仿佛是中医诊断书:“心胃之间,喜气充周,忽而气逆,奄然遂逝”。^[8]林纾并非不能理解该书的主题,只是如果他认为中国急需的并非这种坚忍、博爱而是西人的尚武精神,他更怕书中宣扬的这种非暴力抵抗会钝化国人的灵魂心志,因此将相关内容尽数删除。哲而治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要回到非洲,献身于提高黑人地位的事业。在这封信的译文里也处处流露出了这种改写的痕迹。哲而治认为自己此去非洲是遵循上帝的旨意:“Is there not a God above all men's scheme? My He not have overruled their designs, and founded for us a nation by them?”他反复表明非洲发展的驱动力是文明与宗教:“Our nation shall roll the tide of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I think that the African race has peculiarities, yet to be unfolded in the light of civilization and Christianity.”而且他认为非洲民族的特性恰是基督教提倡的博爱与宽容:“I tru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is to be essentially a Christian one... They are an affectionate, magnanimous, and forgiving one.”^[9]这种提倡以宗教为原动力的“保种自强”的诉求因其温和的非暴力抵抗模式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抵牾而遭到了无情的删除。

3、译者按照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增添原文所没有的文字,或补缀情节,或发表议论,表达译者在阅读原作时所产生的思想情感。例如周桂笙的《毒蛇圈》译文中讲到“那福瑞是个法国人,未曾读过中国书,要是他读了中国书,他此时一定要掉文,引着孔夫子的两句话说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了。闲话少提,且说白路义……”^[10]译者在中国传统文学背景下理解原作,发表议论插入译作抒发自己的感想。译者的做法还跟中国传统带有说书倾向的白话小说中作者喜欢在文中“插入”自己的议论或评论有关。林纾在翻译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小说《冰雪姻缘》时,不由自主地插入自己的句子:“书至此,哭已三次矣!”^[11]又如《黑奴吁天录》第十三章的开头,增加下两句:“著书者曰:吾于以上十二章,均叙悲惨断肠之事,令人寡欢。今吾须少易壁垒,令观者一

新其耳目乎”。这也是原书所没有的。林纾增添的目的是想把读者的视线从汤姆的际遇转移到意尔赛所处的新环境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再如清末鸳鸯蝴蝶派作家李常觉和陈小蝶两人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卷首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And that was... how the best plans of Mr Sherlock Holmes were beaten by a woman's wit He used to make merry over the cleverness of woman, but I have not heard him do it of late And when he speaks of Irene Adle, or when he refers to her photograph, it is always under the honorable title of the woman. 上述描写翻译如下: 捧此小影而归培刻街, 悬之壁间。笑而语华生: 天壤间有此女郎, 吾悔多矣。综吾生平, 未尝有一失败。今乃失败于个人。予因笑曰: 苟其人而非惹伦爱答, 而君亦非福尔摩斯, 则此两人可以为……福曰: 华生又雅谑矣。福尔摩斯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在其侦探生涯中, 只有一次让对手彻底击败, 即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Irene Adle。但福尔摩斯虽失败了, 仍对她敬服不已。李、陈两人的中译本里, 译者添加杜撰了华生向福尔摩斯的调笑, 这种译者增添的调笑却正是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凸现。在中国, 文人与艺妓交往的传统是顺理成章的。在此译本中, 译者添译的最后几句话更是把华生与福尔摩斯的关系歪曲为中国当时风流名士与艺妓般的关系, 这与原著中他们两人相互尊重, 而在私生活方面却保持相当距离的情节描述完全两样, 因此, 从这个实例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译者以本人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取向为理解基础而对译本进行增译。

4. 译者将原作的人名、地名、称谓本土化乃至典故改成中国式使之符合中国主体传统文化规范。

例如《大除夕》中出现的“吉尔”、“花姐”、“户部大臣袁松”、“礼部大臣邓微”、“龙泉寺”等,《义勇军》中出现的“阿姊”、“兰姐”、“妾”和《卖国奴》中出现的“郎君”等。这种将外国人名、地名、称谓改用中国式样, 并非是上述几本小说中的个案。《电术奇谈·附记》明确提到: “原书人名、地名, 皆系以和文谐音, 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 地名皆用中国地名, 俾读者可省脑力, 以免艰于记忆之苦。”鬘红女史在评价《红粉劫》时也说到: 《红粉劫》所译地名人名, 皆用中国习见之字眼, 可省读者许多脑力, 此非失

真。Uncle Tom's Cabin 原文中对夜娃的描写“Evilrolls Eva's mind like dew off a cabbage-leaf.”在林译本《黑奴吁天录》中被译为“此女盖出水新荷耳, 骤雨密点”。显然林纾认为卷心菜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替之以荷花——中国传统文化中圣洁、高尚的化身, 正所谓“出污泥而不染, 濯青莲而不妖。”到此仍觉犹未尽, 将几滴露珠换作急密骤雨, 以彰显女主人公的高尚品质。林纾以中国式的“出污泥而不染”荷花来替代卷心菜显然是为了迎合中国主体文化审美规范。

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行为, 因而同别的社会行为一样也要遵从某种规范。虽然规范本身并不是显性的, 但是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在两种语言、文化、篇章传统之间进行取舍, 翻译规范便由此而体现。评判近代翻译小说显然不能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观察, 即将其与原文对照去考证它“忠实”与否。因为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出现的在今天看来不正常的种种现象均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翻译规范论特别强调社会, 文学规范, 强调这些规范对译语文化的控制及对整个翻译过程产生的直接影响, 因此其对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活动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可见用翻译规范论去观照中国近代小说翻译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可以说, 图里的翻译规范论以其较严密的理论体系突破了以往那种静态的、孤立的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中衡量成败的价值评判标准, 代之以一种动态的系统的方法考察描述翻译过程, 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翻译小说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 [1] 阿 英. 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M]. 上海: 中华书局, 1960.
- [2]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897-1916)[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3]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4] 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The Manipulation of Norms on the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ranslation

LIAO Bei-hui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n activity of languages but also that of societies and cross-cultures. All the activities in translation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texts, the management of skills and the issue of translations are manipulated and normalized by such outer elements as the societies and cultur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Gideon Toury's norms theory, this paper tries to carry on a descriptive study on the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ranslation and analyzes how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normalized by the special modern Chinese social-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translation norms; manipulation; modern Chinese special social-cultural context;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ranslation; descriptive study